

# 長江中游出土商代青銅器研究（一）

／萬全文

長江中游地區尚未出土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銅器，但在石家河文化遺址中出土過銅塊，何況這裡乃銅料盛產之地，製陶業也頗為發達，具備了鑄造青銅器的技術前提，無疑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即已踏上了青銅時代的門檻。隨著南進的殷人帶來先進的青銅鑄造技術，該地區也就順理成章地登堂入室，開始青銅器的鑄造。

## 一、江漢地區出土的中原商器

在湖北出土的商代青銅器中，以黃陂盤龍城出土的為最早，相當於商代中期，這也是長江流域出土的時代最早的青銅器群。

盤龍城的青銅器主要出土於墓葬。一九六三年在盤龍城西面的樓子灣清理墓葬五座，出土青銅器三十八件；一九七四年在城東李家嘴清理墓葬三座，出土青銅器六十七件；同年在城北的楊家灣清理墓葬二座，出土青銅器一件；在城南清理墓葬一座，出土青銅器二十二件。此外還在周圍採集到青銅器二十餘件。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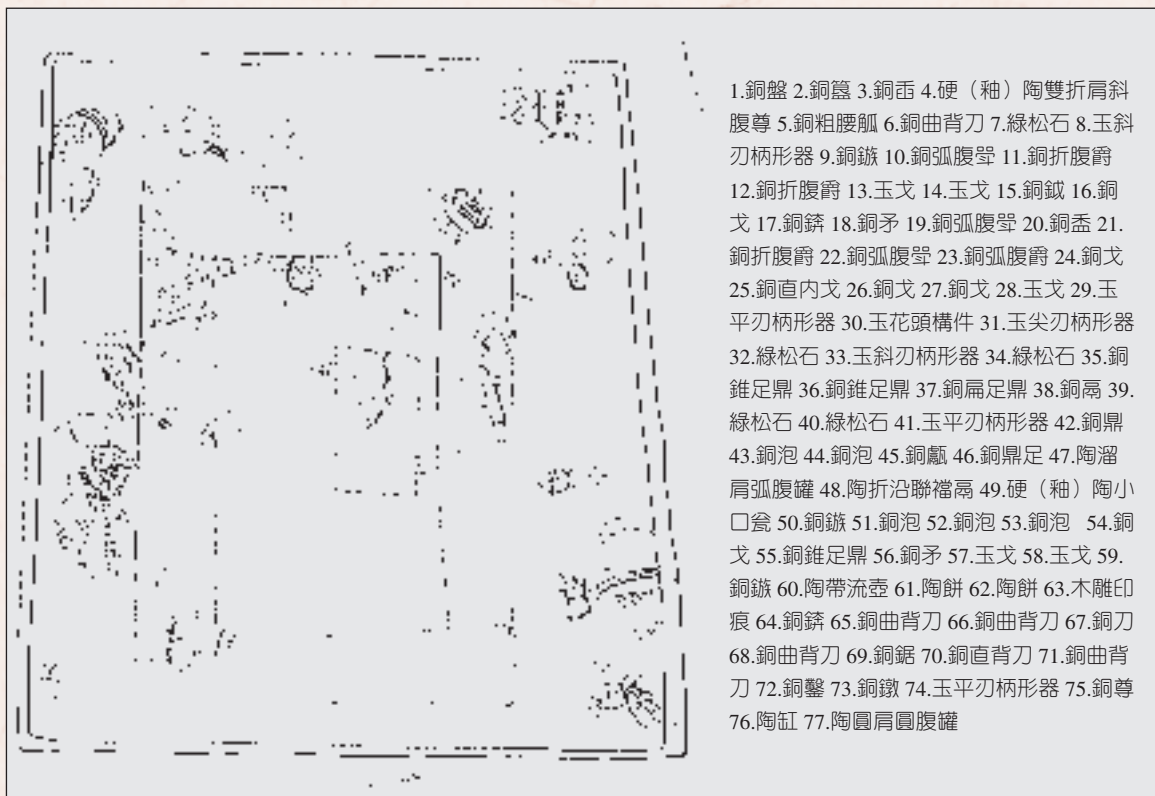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統計，當時盤龍城即已出土青銅器一五九件，器類達二十五種。（註一）之後在盤龍城周圍的墓葬、遺址、窖藏等處又陸續出土青銅器二〇〇餘件，盤龍城出土的青銅器總數達四〇〇多件。

見於報導的盤龍城出土的青銅器主要有工  
具如錘、斨、斧、鏃、鑿、鋸、魚鉤等；武器  
鉞、戈、矛、刀、鏃、鏃；禮器鼎、鬲、甗、  
簋、罍、爵、觚、盃、盥、壺、卣、盤等。（圖  
一）

各墓隨葬青銅器以李家嘴一號墓、二號墓居多。二號墓為男性墓，未經擾動。（圖二）該墓是一座長方形豎穴墓，墓長三·六七公尺，寬三·二四公尺，葬具為重槨單棺。槨板有精細的饕餮紋和雲雷紋雕花，內側塗朱。墓內隨葬品除青銅器外，還有陶器、印紋硬陶、玉器，並有三人殉葬者。從現存的考古資料來看，該墓是商代二里岡時期墓葬中規模最大、隨葬品最多的一座，墓主應係盤龍城的最髙統治者。該墓出土的一件青銅鉞，長四一公



圖一 盤龍城出土的鼎、罍、簋、甗、卣、爵



- 1.銅盤 2.銅簋 3.銅缶 4.硬（釉）陶雙折肩斜腹尊 5.銅粗腰觚 6.銅曲背刀 7.綠松石 8.玉斜刃柄形器 9.銅鏃 10.銅弧腹罍 11.銅折腹爵 12.銅折腹爵 13.玉戈 14.玉戈 15.銅鉞 16.銅戈 17.銅鏃 18.銅矛 19.銅弧腹罍 20.銅盃 21.銅折腹爵 22.銅弧腹罍 23.銅弧腹爵 24.銅戈 25.銅直內戈 26.銅戈 27.銅戈 28.玉戈 29.玉平刃柄形器 30.玉花頭構件 31.玉尖刃柄形器 32.綠松石 33.玉斜刃柄形器 34.綠松石 35.銅錐足鼎 36.銅錐足鼎 37.銅扁足鼎 38.銅鬲 39.綠松石 40.綠松石 41.玉平刃柄形器 42.銅鼎 43.銅泡 44.銅泡 45.銅甗 46.銅鼎足 47.陶溜肩弧腹罐 48.陶折沿聯襠鬲 49.硬（釉）陶小口瓮 50.銅鏃 51.銅泡 52.銅泡 53.銅泡 54.銅戈 55.銅錐足鼎 56.銅矛 57.玉戈 58.玉戈 59.銅鏃 60.陶帶流壺 61.陶餅 62.陶餅 63.木雕印痕 64.銅鏃 65.銅曲背刀 66.銅曲背刀 67.銅刀 68.銅曲背刀 69.銅鋸 70.銅直背刀 71.銅曲背刀 72.銅鑿 73.銅鏃 74.玉平刃柄形器 75.銅尊 76.陶缸 77.陶圓肩圓腹罐

圖二 李家嘴盤龍城四期二號墓平面圖

分，刃寬二六公分，是目前所發現的銅鉞中最大的一件。（圖三）根據該墓的出土器物綜合觀察，說明墓主人生前是擁有很大軍事統率權的統治者。（註二）

二號墓出土青銅禮器二十三件，其中酒器類有爵四件，罍三件，盃、觚及壺各一件；食器類有鼎四件，鬲、甗、簋各一件；水器類有一件大盤及五件小盤。酒器除一件罍外，其餘都放置於棺與內槨之間，而食器則放在內外槨之間。槨內近棺，槨外遠棺。這些器物與墓主人顯然存在親近與疏遠的關係。也就是說，凡墓主人生前特別喜歡因而特別看重的器物，就置於身旁，而墓主人認為次要物件，則放在稍較遠的地方。由此可見，商代早期的銅禮器已經是「重酒器的組合」，而輕炊食器的組合，與西周中期開始的「重食器的組合」有所不



圖三 鉞 盤龍城出土

同。這或許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周禮」和「商禮」的區別。

在中原夏商銅器墓中，酒器爵、觚、罍是最基本的銅禮器組合，以爵最為常見。在二里頭遺址所發現的銅器墓中，如果只出一件銅容器便必定是爵，若有二件或更多的銅容器，其中必有爵。在鄭州發現的十五座商代銅器墓中，出爵者占百分之八十，而其它銅禮器如鼎、罍、觚的出土率，各自只占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在安陽殷墟，一九四九年前發掘的銅器，以爵最多；一九四九年後在西區發掘的六十七座銅器（或仿銅器的鉛器）墓中，也無一例外地有爵。（註三）

銅爵發源於中原地區，最早出土於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至商代二里岡期時，銅爵隨著中原青銅文化向周邊地區的擴展而同步擴散，反過來說銅爵的擴散，也大體代表著中原文化勢力的擴張，儘管各地所見銅爵並非全部來自中原地區。盤龍城出土的以銅爵為代表的青銅器，就是中原商文化南進的結果。在早期所發掘的十一座墓中，除李家嘴三號墓出土一件罍，四號墓出土二件兵器外，其餘皆出土有爵，李家嘴一、二號墓分別為四件和五件。

至少在商代，銅爵在酒禮器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崇高的，《博古圖》卷十四說：「蓋爵於飲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曰在禮實大。爵於彝器是為至微，然而禮天地、交鬼神、和賓客以及冠、婚、喪、祭、朝聘、鄉射，無所不用，則其為設施也至廣矣。」如此

概括頗為精闢。銅爵在商代青銅禮器中居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除了「在禮實大」、「設施至廣」之外，還因為銅爵是「明貴賤、辨等列」的標尺，能否擁有銅爵以及擁有銅爵的多少，都是當時區分人們社會地位的重要尺度。（註四）所出土的銅爵，形制略有區別，主要有雙柱和單柱爵兩種。雙柱爵器身橢圓，直腰寬腹，下腹微斜凸出，平底下連三細尖足；口沿前端突出長流，流嘴似V形，後端如短尾微翹，而流根與口相連轉折處，兩側面各作一短柱加固，以防傾倒碰裂，（註五）柱頂似釘頭；口沿下腹部右側，附一扁平狀把手，以供右手提舉。採集所得的一件單柱爵，器身扁圓而長，腰腹作二段式，上端腰高似長頸而直，下端腹寬鼓突，底平足短；口與流相接處，用一單柱分叉而立，柱頂似笠帽形。銅爵的紋飾主要為獸面紋，以平雕為主，缺少層次，是全無立體感的平板表現；在紋樣縫隙之間，也無地紋補襯，顯得單調樸實，是典型的早商銅器特徵。儘管如此，商代早期的藝術工匠，能將動物的寫實描寫，簡化成至精而單純的平面圖案，還不失其動物體態，具象與抽象兼備，造型稚拙，卻線紋流暢，充分顯現原始古樸的美感，這是頗令人嘆服的。

盤龍城出土的青銅器在器類、形制、紋飾等方面無不與鄭州二里岡出土的商器相吻合，表現出兩地文化的高度一致性，而且在李家嘴一、二號墓出土的銅甗、簋、提梁卣等器物為新發現的器類，大大豐富了早商青銅文化的內

容。

這裡出土的青銅器應是就地冶鑄而成的，在盤龍城遺址中，發現了一些孔雀石、木炭、紅燒土等，所需銅料應是就近取得。

這些銅器的合金成份並不穩定，有的銅約占百分之八十一至八十八，錫、鉛分別占百分之五至八和百分之一至六，有的銅含量相對偏低——約占百分之七十一左右，而含鉛量高達百分之二十一至二十四。總之，還未能掌握一個比較適當的合金比例，這種情況也和鄭州二里岡期的青銅冶金術大體相同。

青銅器的鑄造工藝已達到一定水平，一九九〇年在這裡出土的一件圓鼎高八十五公分，是目前所發現的二里岡時期最大的一件圓鼎，它反映了當時的鑄造水平。鑄造方法是普遍使用了陶合範的通體渾鑄，但也使用了分鑄法，如對於卣的提梁、簋的雙耳等器物的附件是先鑄後再通體合鑄而成的。從容器裡側平滑，器表花紋浮於器面的情況看，其鑄造工序是先製模、模上雕花、再製內外範。從所出青銅器大小不一，花紋各異，未見二件完全相同者，其鑄造應為一器一範。從銅器表面光亮，則可看出在範鑄後已行打磨修飾。

總之，盤龍城出土的二里岡期的青銅器，只能視為中原青銅文化向長江流域的延伸。

湖北境內除盤龍城之外，還有多處發現商代青銅器，但主要分布在漢水以東和長江以北地區。略述如下：

一九七七年在隨州浙河出土青銅器十三

件，計有爵二、觚一、罍一、盃一、斧一、刀二、戈一。可能出土於墓葬之中，為商代中期器。

一九七八年在宜都王家渡出土銅罍一件，商代中期器。

商代晚期的銅器出土地點分布較為廣泛，主要有：應城出土有銅爵、罍、鴉卣各一件；

應山長嶺出土銅鼎一件；

隨州熊家老灣出土銅罍一件；

棗陽新店出土銅尊一件；

黃陂袁李灣出土銅罍一件，銅家崗灣出土

銅爵一件；枞桐官家寨出土爵一件、觚二件；

漢陽紗帽山出土銅尊一件，竹林嘴出土銅

方彝一件；

鄂城陳林寨出土銅爵一件，鑿內有銘文

「癸父己」；

崇陽汪家嘴出土銅鼓一件；

陽新白河出土銅尊一件；

沙市東岳村出土銅尊一件；

江陵岑河廟與八姑台出土銅尊二件。

在上面所述的商代銅器中，有幾件頗具代表性。其一，為漢陽紗帽山出土的銅尊（圖四），高三七·一公分，喇叭口，腹微鼓，高圈足。器身飾滿三層花紋，雲雷紋襯底，頸飾蕉葉紋，其下作回首夔紋，腹部及圈足飾饕餮紋；在主紋的凸線條表面刻劃脈絡以為勾勒。圈足上有兩個對稱的不透空十字形鏤孔。器身從上至下起四條侈出口沿的扉稜。圈足內鑄銘

文「天獸御」。全器鑄造精工，紋飾富麗，其工藝水平之高，堪與殷墟出土的青銅器媲美。（圖五）

其二，為崇陽汪家嘴出土的銅鼓。銅鼓出土於一九七七年，通高七五·五公分，重四二·五公斤。鼓身橫置，鼓面呈橢圓形，鼓冠似屋脊的兩面坡，鼓座作長方體中空。鼓面仿牛皮鼓面，光素無飾。沿鼓腔兩端邊緣各飾三周乳釘紋，為模仿木鼓蒙鼓面所用的釘。鼓身及鼓足飾雲雷紋。目前所知商代銅鼓共二件，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一件銅鼓，較之日本濱田耕作《刪訂泉屋清賞》所著錄的雙鳥饕餮紋銅鼓更為古樸。龍山文化遺址已出土陶製的鼓，甲骨文中也有鼓字，鼓的歷史非常悠久。《禮記·明堂位》記：「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懸鼓。」《毛詩傳》記：「夏后氏之足鼓，殷人置鼓，周人懸鼓。」鄭玄注：「置讀作植。」楹鼓、置鼓亦即建鼓，湖北隨州市曾侯乙墓出土過一件。上述兩件皆為足鼓，其為夏代的遺韻，抑或史籍記述有誤，尚待考古資料印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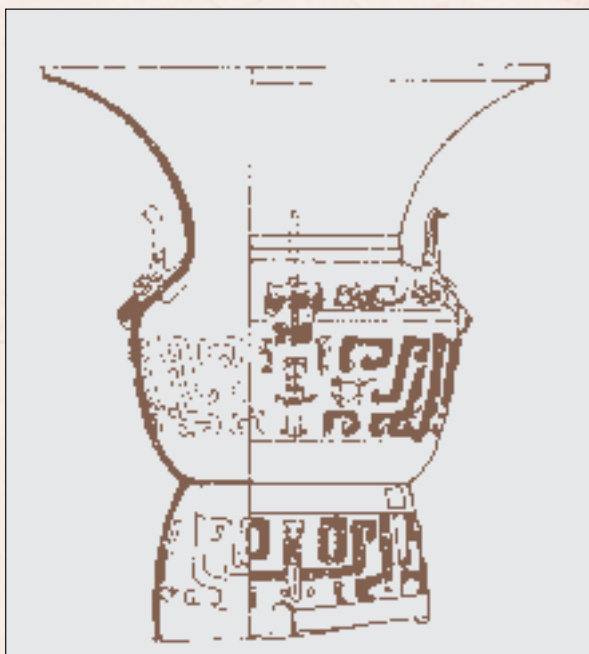
其三，為江陵岑河出土的二件銅尊。兩件銅尊形制基本相同，但大小有別，大尊口徑五七·八、腹徑三八、通高六三·五公分，重三一·三



圖五 銅鼓 湖北崇陽出土



圖四 銅尊 漢陽沙帽山出土



圖六 銅尊 湖北江陵出土

公斤；小尊口徑四六·二、腹徑三四·五、四六·二公分，重一六·五公斤。兩尊均為大敞口，口沿上折，尖唇，束頸，略呈喇叭狀。廣折肩，斜直腹，下壁微內收，高圈足，足壁微外鼓。頸根部飾凸弦紋三周。肩、腹、圈足某些部位以雲雷紋襯地。肩部雕鑄三鳥三犧首，鳥身向外，作伏臥狀，大頭，長嘴鉤喙，尾上翹。犧首長角，鼻口清晰。在鳥與犧首之間，飾三組對稱的夔紋圖案。腹、圈足各起三道扉作稜，扉稜間各起一組饗鬃紋，饗鬃紋由兩條夔紋構成，尾下卷。圈足的三道扉稜之上各有一個鏤孔。銅尊造型凝重，製作工藝精湛，立雕鳥與犧首比例準確，形象生動，浮雕饗鬃紋

疏密得當。這樣的銅尊在江漢地區尚屬首見。（圖六）（註六）

湖北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既有以盤龍城青銅器群為代表的商代早中期青銅器，也有一部分商代晚期的青銅器。盤龍城青銅器群因為有殷人的直接參與，而在長江流域獨領風騷，並足以代表著當時中原地區的青銅鑄造水平。但屬於晚期的那部分青銅器則無論數量還是鑄造工藝水平不僅比中原地區遜色，也大大不如湖南、江西出土的同期青銅器。（待續）

註釋：

- 一、〈盤龍城商代二里岡期的青銅器〉，《文物》一九七六年一期。
- 二、楊錫璋、楊寶成〈商代的青銅鉞〉，《中國考古學研究》第一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 三、杜金鵬〈商周銅爵研究〉，《考古學報》一九九四年三期。
- 四、鄧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年；楊錫璋等：《殷代青銅禮器的分期與組合》，《殷墟青銅器》，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 五、張光遠〈金爵〉，《故宮文物月刊》三四期，一九八六年一月。
- 六、王從禮〈記江陵沔河廟興八姑台出土商代銅尊〉，《文物》一九九三年八期。

